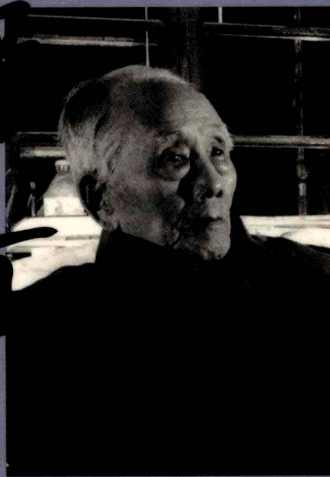


人民才是真正的音乐家

贺绿汀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蒋 晔 武京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贺绿汀

蒋
晔

武京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绿汀人生智慧/蒋晔, 武京予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8. 9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ISBN 978-7-202-05016-3

I. 贺… II. ①蒋…②武… III. 贺绿汀(1903~1999)—人物研究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925 号

书 名	贺绿汀 ——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
著 者	蒋 晔 武京予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3
字 数	57 000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5016-3/K·904
定 价	6.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贺绿汀：中国音乐界的正气歌/1

贺绿汀小传/17

贺绿汀的故事/18

文
化
名
人
人
生
智
慧
丛
书

贺绿汀：中国音乐界的正气歌

1996年10月13日，我们从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乘坐全日空大型客机，呼啸着直冲云天，飘洋过海，向着祖国的方向飞来。当亲爱的祖国那漫长的黄金海岸线渐渐映入眼帘的时候，当东方明珠——上海那充满着魅力的城市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想到：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在近现代诞生和云集了多少为中国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巨匠。93岁的贺绿汀先生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巨匠之一，因为他创造了许多多个中国音乐界的第一。



1932年，贺绿汀和姜瑞芝新婚照。

研究贺绿汀的专家戴鹏海先生说：贺绿汀是最早对中国钢琴音乐、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和民族器乐的现代化做出成功探索的作曲家；他的《牧童短笛》、《摇篮曲》，在1934年荣获美籍俄裔作曲家兼钢琴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头等奖和二等奖，首次叩开了中国钢琴音乐通向世界乐坛的大门；他为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片《都市风光》进行配乐，第一次实现了从用现成的蜡盘（即唱片）配音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的过渡；他翻译出版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第一次把欧洲近代的和声理论完整系统地引进中国；他还直接指导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音乐技术理论》丛书和《音乐历史传记》丛书以及其他音乐论著、音乐辞典等；他为培养我国第一代提琴制作人才和技术骨干做出了贡献；1983年，他在第20届国际音乐理事会上当选为荣誉会员，成为中国首次获得这一荣誉的音乐家……

我们怀着敬意，来到贺绿汀先生的家中，捧着一束鲜艳的花朵，献给了他——中国现代音乐启蒙运动的功臣贺绿汀先生。他衣着朴素，静静地坐在靠近窗户一个洒满阳光的沙发里，右手还拿着一个耳塞式耳机。

一、人民才是真正的音乐家

“贺先生，我们刚才在你们家门口的菜市场上，遇到几位正在卖牛羊肉和猪肉的老人。他们看到我手捧着一束鲜花，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泰安路76号弄的弄牌号

码，其中一位老人主动给我打招呼：‘你是来看贺绿汀的吧？’我说：‘是啊！你们怎么知道？’老人说：‘我怎么看不出来！我们这一带就这一个宝贝，来看他的人很多。他可是个国宝啊！现在像他这样大年纪的大音乐家，恐怕不多了。我们做邻居几十年啦！他可是个好老头啊！’”一落座，我们便忍不住地向贺老讲述刚才的见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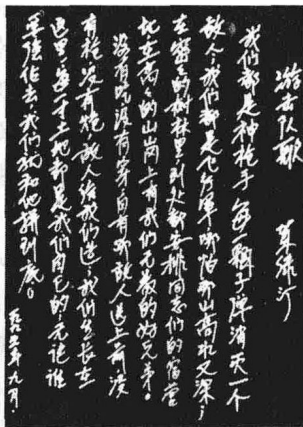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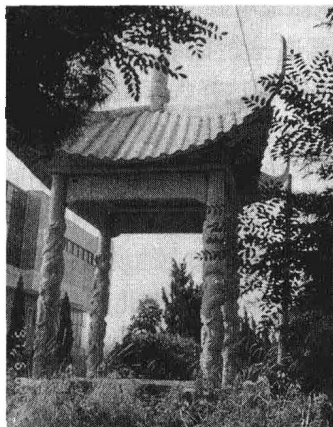
贺绿汀听到此处，会心地微笑起来。他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我们是好邻居。”贺先生的女儿贺逸秋接着说：“邻居对我们家可好啦！到街上买东西，对我们都很关照。”

我说：“是啊！刚才就是一位老大爷一直把我引到你们家，并帮我按响门铃。门打开后，这位老大爷才离开，真是不错。他们知道贺先生爱吃羊肉，不爱吃牛肉、猪肉；还知道贺先生爱拄着拐杖出来溜达，爱和大家聊天、打招呼。他们说贺先生可平易近人了，一点儿也没有大名人的架子。他们都会唱《游击队歌》，还有《四季歌》。”

在座的上海音乐学院医生葛政荣先生说：“《游击队歌》和《四季歌》会唱的人真是太多了。现在几乎每一家卡拉OK歌舞厅都放这些歌。”对贺先生的采访，就是在这亲切、和谐的气氛中开始的。

我们首先问他：“贺先生，《游击队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贺绿汀说：“1937年。”我们继续问：“是在什么地方创作的？”他讲：“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怀着好奇问：“它为什么会诞生在1937年

的临汾？这个时期您不是在上海吗？”



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建有“绿汀亭”。贺绿汀手写的《游击队歌》歌词，被刻碑保存。

贺绿汀的大女儿贺逸秋告诉我们：“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为了抗战，上海文化界组织起了救亡演剧队，爸爸就参加了这个队伍，乘火车进入南京，又乘轮船来到武汉。一路上，大家看到了因为日本侵略而造成的悲惨情景，更加激励演剧队的每一个人，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去。当时，他们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八百壮士》、《弟兄们拉起手来》、《放下你的鞭子》、《上海血迹》等话剧和街头剧，演唱了《全面抗战》、《为祖国而战》、《谁敢夺我一寸土》等歌曲，每次演出都是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决不当亡国奴’的愤怒口号声中才得以结束。

“后来，又有几个月，他们在陇海线上来回跑了好几趟。这个时期，爸爸写了《上战场》这首歌。接着，他们就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提出要求，一定要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于当年11月底从潼关渡河到陕西风陵渡，然后乘同蒲路列车北上到达山西临汾。

“此时太原已经失守，临汾成了重镇，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那里，办事处主任是彭雪枫。在那里，爸爸听到许多有关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的故事，并对什么是游击战争有了进一步了解。正是在那个抗日救亡的时代，正是在战争的枪炮声中，爸爸带着一种激昂的情绪，一口气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并一气呵成，谱好曲子。”

谈着谈着，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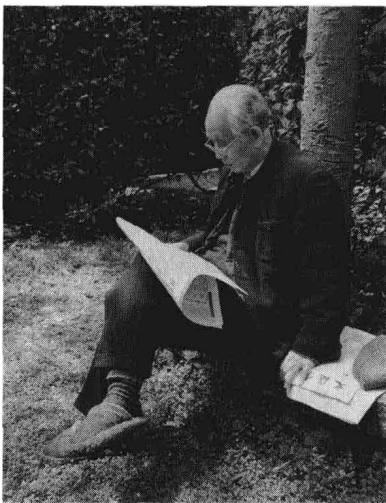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贺绿汀听到歌声，满面红光地小声哼唱起来，他的右手还微微抬起，有节奏地打着拍子，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弥漫硝烟中。

“贺先生，您这首歌的歌词，在当时最有意义的是：‘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今天要搞祖国统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依然要像当年抗日一样，不分穷，不分富；不分党，不分派，大家共同促成祖国统一。统一了，中国才能真正富强起来，日本才不敢染指我们的钓鱼岛。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您知道吗？”

说到钓鱼岛事件，贺先生马上来了劲头：“钓鱼岛事件我知道，我每天都看报，什么新闻大事我都知道。日本想恢复军国主义，又想侵略我们的领土，这办不到。最近《参考消息》报道了一些钓鱼岛事件的情况，咱们香港还牺牲了一个人，叫陈毓祥。”

我们告诉贺绿汀：“我刚从日本回来。在东京，日本最大的华文报纸《中文导报》负责人接待了我。他希望我能在他们的报上开一个《中国杰出文化名人纵论中日关系》专栏，以便让日本社会真正了解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让日本右翼分子好好反省反省，也提高提高日本人的警觉。到时候，我要将您的《游击队歌》



读报是贺绿汀每天的必修课，这是摄于1992年他读报时的专注情景。

这首歌曲发表于日本的中文报纸上。您说好不好？”

贺绿汀说：“好！好！”

我们继续关心的话题：“《游击队歌》首次演出是在什么地方？”

贺绿汀清楚地回忆道：“演出地方就是八路军在临

汾的办事处。演出时，啥也没有，只好用口哨做伴奏。”

这时，他女儿送给我们一份资料，只见有下面的记载：在首次演出时，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还有国民党的卫立煌，他们是这首歌的第一批听众。唱完歌后，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朱老总笑着说：“这首歌写得好呀！”将领们都说：“战士们就是需要这种歌。”于是就要求演剧队抓紧时间到部队教唱这首歌。有的部队还专门派人骑马跑几十公里来抄这个谱子。

从平型关战场上打了胜仗到临汾休整的685团团长杨得志，在即将率领部队开往前线时，还急切地邀请演剧队到部队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杨得志说：“唱会了这支歌，就出发。”就这样，这首歌很快在八路军将士中传开了，后来也传到敌占区。

白求恩大夫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常常在行军中哼唱，美国友人卡尔逊不仅自己爱唱，还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多次提到这首歌，并大段引用其中的歌词。1943年贺绿汀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他时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呀！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的。”解放以后，中央决定要排演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有人提出要删掉《游击队歌》。周恩来总理说：“这首歌不能去掉。当年，有很多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来到延安、走上抗日前线的。”

我们问：“贺先生，您是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您在30年代的上海为电影谱写了大量的作品。凡是看过《十字街头》的人，无人不会唱《春天里》

这首歌：‘春天里来百花香，……’凡是看过《马路天使》这部电影的人，无人不知著名电影演员周璇演唱的《四季歌》：‘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

贺逸秋说：“爸爸在30年代，为《船家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胜利进行曲》等一二十部电影谱写了歌曲和器乐作品。我爸爸走上电影音乐创作道路和聂耳有很大关系。爸爸和聂耳关系很好，由于爸爸比聂耳大8岁，所以聂耳很尊重他。当时，聂耳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先走了一步，影响很大，效果很好。他就动员我爸爸积极参与，以便通过这个渠道，创作出更有影响的通俗爱国歌曲来，以鼓动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样既可以提高大众的音乐欣赏能力，又能尽到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我爸爸在30年代就把创作重点放在了电影音乐上。《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流行很广的歌曲，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再加上著名电影演员周璇非常投入，唱得很有感情。所以，这两首歌曲至今还保持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这个时期你爸爸创作的电影歌曲，大都采自民歌曲调，是不是可以说，丰富的民歌艺术滋养了、成就了您父亲。”

贺逸秋讲：“是这样。爸爸常说，中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民间音乐遗产之丰富，世所罕见。我们作曲家就好比是蚕，而民间音乐就是桑叶。蚕只有吃了桑叶，才能吐出丝来。所以，作曲家一定要熟悉民歌，最好能熟背500首。只有这样，才能下笔如有

贺绿汀——中国音乐界的正气歌

神。民歌就像野地里开出来的小花，多姿多彩，由于它们植根在民族生活的土壤深处，所以很有生命力。一首好的民歌能在人民中间流传千百年，原因就在于此。”



贺绿汀在钢琴上作曲

二、说真话

上海音乐学院的葛政荣先生，为了使我们采访贺绿汀先生获得成功，他从家里拿来好多非常珍贵的照片资料，我们爱不释手地翻阅着，一下子看到了贺绿汀和巴金先生的合影照。

葛政荣告诉我：“这张照片摄于1994年6月份，是在巴金家里。那一天，两位老人通了电话，很想念，于是贺先生就启程来到巴金先生的寓所，我也一同前去。他们两位老人谈兴甚浓，共同话题很多。我很钦佩这两位老人，他们一个是文学巨匠，一个是音乐巨匠。



1994年6月4日，巴金与贺绿汀在一起亲切交流。
(葛政荣摄)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讲真话’。讲一次真话容易，讲一辈子真话就不是那么容易啦！巴金老人和贺先生就是一辈子都敢于讲真话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时候。”

贺逸秋告诉我们：“爸爸是个‘老天真’。他不管什么政治气候，都敢讲自己的心里话，从不绕弯子，从不考虑保护自己。这一点和巴金老人很像。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好朋友。”

贺绿汀一边仔细地端详着他和巴金的合影照片，一边点头赞许我们的谈话：“我和巴金家离得很近，你可

以去专访他，巴金很喜欢年轻人。”

葛政荣先生很快拨通了巴金先生寓所的电话，说明了意图。巴金先生的家人在电话里说：“巴金老人现在杭州疗养，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到时你们再来。”

贺绿汀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蹲监狱，主要是‘四人帮’造成的。江青已经自杀了，王洪文、张春桥好像也已经死了。听说姚文元近来要出狱，这是小道消息，不知准确不准确。姚文元是个文痞，他害死了很多人，我就是受他的害。哎，害人的人，我看最终没有好下场！”

谈起姚文元迫害贺绿汀的往事，我们马上追问：“贺先生，您在‘文革’中的灾难，怎么和姚文元有关系？”

贺绿汀说：“还不是因为一篇文章！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批评了他，他就借题发挥，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贺逸秋接过话题讲：“萧庆璋同志有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

我们接过贺逸秋送给我们的书《论贺绿汀》，翻出了萧庆璋的那篇文章。事情的原因是这样：1963年5月2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姚文元摆出一副教师爷、批评家的架子，用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责问音乐出版社为什么要出版大量的西洋名著？为什么要出版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著作《克罗斯先生》？姚文元追问这到底要表达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对西方资产

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经历这次事变的萧庆璋在文章中回忆道：“姚文元·文章刊登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贺绿汀先生的电话，说文章有错误，希望我到他家去一下。当晚我去看他时，他十分激动，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是：‘糟糕呀，糟糕！报纸怎么发表这样的文章……’姚文元摆出一副批评家的架子，要出人家‘洋相’，结果却出了自己洋相。文章简单粗暴，没有把德彪西书中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主观想象大加发挥，闹出了笑话。此风绝不可长：我们对外国音乐作品、书籍介绍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后来，贺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发表在当年6月25日的《文汇报》上，告诫姚文元：“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当时的上海市委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斗争新动向，是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了出来，一定要抓住狠狠批。就这样，上海出现了一个批判贺绿汀的包围圈。贺绿汀先生就自然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的眼中钉、肉中刺，张春桥等一直把这件事情视为‘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3日，上海音乐学院门口就贴出了批判贺绿汀的大字报。6月8日早上7点，上海人民广

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报道：“今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登重要文章——《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接着，新华社转发消息，贺绿汀就成了被讨伐的“罪人”。

后来，“文化大革命”逐步升级，全国形势一片混乱，贺绿汀的遭遇更加悲惨。到1968年，终于发展成由张春桥亲自指挥，由徐景贤、于会咏台上坐镇的全市性电视批斗大会。“四人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管批斗大会是多大规模，贺绿汀都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从不屈服，从不认罪，从不求饶。全市性的电视批斗大会，反而变成了贺绿汀最好的讲坛，他从一个“被审判者”变成了“审判者”。

《贺绿汀传》的作者史中兴先生，在谈及他为什么要写这本著作时说：“我认识贺绿汀先生，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68年4月25日，凡是在上海看过这天电视批斗大会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因为在那样一个一切都被颠倒的年代，凡是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押上批斗大会审判台的，照例都得垂着脑袋，招认几声‘我有罪’！而贺绿汀却说：‘我没有罪！你们把无罪打成有罪，你们才是有罪！’像他这样把一场对他的审判变成对‘审判者’的审判，就我有限的见闻，在‘文革’中还没有第二个。这个场面强烈地震撼了我。屋里一团漆黑，我却猛然感到一片辉煌，热流在我周身激荡，我看到了前景，看到了希望。粉碎‘四人帮’后，我到报社工作，与贺绿